



## 苏联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间：2006-12-21 9:51:11 来源：俄罗斯研究中心 阅读407次

金重远\*

内容提要：为遏制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苏联自1933年起便通过“东方公约”、莫斯科谈判试图和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未获成功。此后，为避免提前卷入战争，苏联先后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二战期间，苏联又通过与英美的结盟，保障了自身战后在波兰、德国和远东的利益。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明确，在二战的动乱年代，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利益。

关键词：民族利益 集体安全 “东方公约” 莫斯科谈判 互不侵犯 三国合作

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一向为世人所称颂，但环绕着苏联政府在上世纪30-40年代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却颇有争议，作者试在本文中对此作一简要之概述，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和指正。

### 一、集体安全：面向英法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公开扩充军备，叫嚷着撕毁凡尔赛条约，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苏联自1924年起虽已获得不少欧洲国家的承认，并加入《非战公约》和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面临新的世界战争的威胁，不得不加大对外政策的灵活性。

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作出有关为集体安全而斗争的决议，主张运用集体的力量来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活动。苏联最初拟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随即向美国建议签订中日美苏四国互不侵犯条约，但未有任何回应。

[1]

苏联政府此后遂把目光转向欧洲，试图在这里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早在1932年11月，法国便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10月，法国外长保罗—彭古尔又主动建议苏联方面：如果形势需要，可使两国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发展为互助条约。[2]苏联政府随即作出积极反应，于12月20日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送交法国方面。随后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又指出，有必要建立东欧的“洛迦诺”，以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3]

1934年2月，积极主张重现19世纪末法俄同盟以遏制希特勒扩张的巴尔都就任法国外长，他立即向苏联表示愿意继续两国在1933年底开始的对话，表明法方对

苏联有关集体安全的建议非常感兴趣。[4]

在外交接触的基础上，1934年5月18日，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法外长巴尔都举行首次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尽快订立《东方公约》，形成两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把“西方洛迦诺”延伸到东方去，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后因德国和波兰的坚决反对，于是苏联遂退而求其次，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邀请，于9月18日正式加入国联，并出任该组织的常任理事国，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由于巴尔都于10月9日在马赛遇刺身亡，于是《东方公约》也只得告吹。尽管接替巴尔都上任的法国新外长赖伐尔对法苏同盟丝毫不感兴趣，但苏联仍和法国在1935年5月2日签订了《法苏同盟条约》，明确规定两国一旦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无端攻击，双方应立即给予帮助和支援。5月16日，苏联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内容相似的《苏捷互助条约》。[5]

1938年3月，当苏台德危机刚爆发时，苏联政府便告知捷克方面，苏联在德国一旦进攻捷克的情况下将忠实地履行《苏捷互助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法作了通报。随后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又于5月12日向法国政府建议苏法两国参谋部应就如何实施对捷援助问题进行协商，但未得任何回应。

[6]9月初，苏联建议英法两国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召开三国参谋部代表会议，共同协商反侵略的具体事宜，但英法仍置若罔闻。9月19日，苏联又向捷克发出明确信息，即形势需要，捷克又提出请求，那么苏联定将不折不扣地履行《苏捷互助条约》。[7]当苏台德危机达到最高潮，欧洲局势空前紧张时，苏联在捷克边境集结1个坦克军团、3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7个坦克旅的大量兵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8]很显然，苏联此时仍希望和英法联合行动，以遏制德国在欧洲的侵略。

直到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英法才恍若大梦初醒，开始和苏联重新接触，商讨共同对付德国侵略的问题。自3月21日起开始了英法苏三国的莫斯科谈判，苏联一开始便采取积极的姿态，建议三国首先签订一项为期5年至10年的互助公约，在此基础上共同援助自波罗的海至黑海与苏联接壤的国家。[9]此后三国便环绕着应向哪些国家提供援助，以及什么是“间接侵略”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谈判无限期地向后拖延。自8月12日起，欧洲局势因但泽危机而日益紧张，三国遂将政治分歧暂搁一旁，转入更实际的军事谈判。苏方全权代表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英方代表则为退休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法方代表则为一兵团司令杜芒克，两人在军界均为“小人物”。德拉克斯甚至连一张全权委任状都没有，无权签订任何协议。他所接到的指示为：“英国政府不愿承担任何可能会束缚自己手脚的义务。因此，应尽力把军事协定局限在最笼统的条款上。”三国在苏军有权通过罗马尼亚和波兰领土去和德国作战，以及各自可提供的武装部队等问题上又出现严重分歧，致使谈判无法继续下去。

## 二、互不侵犯：面向德日

就在三国举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英德也一直在频繁接触。5月19日，英国外

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会晤德国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6月8日，哈利法克斯又公开表示，愿与德国举行会谈，并称可以考虑德国所提出的“生存空间”问题。6月13日和27日，英驻德大使韩德逊接连两次会晤德国外交秘书魏茨泽克，希望能够重开两国谈判。7月中旬，张伯伦首相的经济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在和德国经济界人士的密谈中，甚至提出了《英德合作纲领》，建议两国互不干涉，彼此应相互照顾特殊利益，尤其是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特殊利益，此外还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广泛进行合作。[10]

消息一经传出，欧洲舆论大哗，同时也引起了苏联的高度警惕。5月17日，莫洛托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苏驻德代办阿斯塔霍夫随即向德方表示：“苏德两国外交政策并无冲突”，因而也就“没有理由相互敌视”。5月19日，德国方面告知苏方，准备重开1939年2月起已经中断的两国经济谈判，苏方则回答说，首先应该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然后再就经贸关系进行谈判。

自8月初起，经过一系列接触和磋商，希特勒于8月20日亲自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能在8月22日，至迟则在8月23日接待里宾特洛甫，并称“德国外交部长拥有拟定和签署互不侵犯的全权”。此时，面临重大选择的斯大林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匆忙来到莫斯科，并于8月23日签订了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在此期间双方“将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等”，并强调双方应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可能产生的分歧。

该条约使苏德两国得以保持短暂的和平：在德军入侵波兰、北欧、西欧、东南欧和苏联建立“东方战线”的两年不到时间内双方没有采取敌对的军事行动。

苏联不仅和德国改善关系，而且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远东力求和日本也改善关系。1941年4月13日，苏日便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规定双方应保持友好关系，并在一方遭受攻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11]在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曾表示：“苏联认为在大问题方面原则上容许同日本、德国与意大利合作……”，并指出和日本签约“将是走向未来在大问题合作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12]《苏日中立条约》为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避免两线作战创造了条件，于1945年4月5日被苏联政府宣布无效。

### 三、三国合作：面向未来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当晚丘吉尔即发表广播演说，表示支持苏联的抗战，稍后罗斯福也于6月24日宣布将向苏联提供援助。7月12日，苏英两国缔结了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8月初，以罗斯福亲信霍普金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加深了对苏联决心抗战的理解；11月7日，美国宣布对苏联实施租借法，扩大对苏联的援助。

苏美英三国结成的同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最初借助于这一同盟取得大量物资上的援助，并敦促美英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形成东西两线夹击德国的局面，带来欧战的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当胜负基本已定局时，苏联又通过三国协商合作的形式，安排好有利于苏联的战后世界格局。

1944年5月，当苏军已进入罗马尼亚时，苏英两国外交官员就巴尔干局势进行接触，双方达成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属苏联，而希腊及南斯拉夫则归英国的初步协议。[13]同年10月，丘吉尔再次访问莫斯科，在和斯大林会谈时，又通过书面形式建议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占有绝对优势，英国则在希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两国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平分秋色，一半对一半，获得了斯大林的默许，使丘吉尔深感满意。[14]随后，艾登又立即和莫洛托夫进行磋商，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完全一致，双方均表示将在巴尔干进行密切合作，同时各自照顾好自身的利益。[15]美国对苏英双方的私下协议虽颇有微词，认为有瓜分势力范围之嫌，但并未出面反对。苏英两国一度在巴尔干相互配合，共同促成该地区摆脱德国的统治，斯大林对英国出兵希腊，镇压那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亦未表异议。

波兰是苏联在战争中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斯大林曾多次向美英方面表示：波兰在历史上常“作为一个供德国袭击俄国之用的走廊……”，对于俄国说起来，这是“一种其后果难以忘却的可怕遭遇”，因此苏联对波兰事态的发展决不能袖手旁观，希望波兰在战后是“又强盛，又友好的”。[16]

随着苏军深入波兰境内，得到英国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逐渐失势。1944年7月，以波兰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波兰临时政府成立。在苏联的坚持下，1945年6月23日，在吸收一些其他党派成员的基础上，临时政府扩大为民族团结临时政府，随后便获得了英美的承认。

如果说成立波兰新政府还算比较顺利的话，那么未来波兰的东西部边界问题却成为苏联和美英长期争执的焦点。还在1941年底与艾登会谈时，斯大林便要求英国同意：“波兰应当以德国为代价，向西扩展……”，而苏联“和波兰的边界将以寇松线为主”。在1943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当丘吉尔以三根火柴形象地代表德国、波兰、苏联一起向西移动时，斯大林便立即抓紧时机，明确无误地要求：“乌克兰的领土应该归还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领土应该归还白俄罗斯，也就是说，我们与波兰之间应是苏联宪法规定的1939年的边界线”。[17]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未表异议，波兰东部的边界也就这样解决了。

但波兰西部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却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引起的激烈的争论，当斯大林建议波兰的西部应以奥德河和西尼斯河为界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坚决反对，无法达成协议，最后只得在会议文件中写下这样模糊的词句：

“波兰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应有较多的扩增”。[18]到了1945年夏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和美英则更因波兰西部的边界问题大吵而特吵，斯大林和丘吉尔甚至发展到了相互讥讽的程度。最后只得请波兰代表团前来发表意见，其代表团长贝鲁特在会上大吐苦水，指出波兰在战前已拥有3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把西部边界定在奥德河和西尼斯河，那么也只有30.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领土将大为缩小，如果要保持战前的人口密度，那么波兰至少也要有31.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丘吉尔对波兰人的呼声嗤之以鼻，争论并未能因此而平息。会议的公报

最后指出，波兰的西部边界应为：“前德国东部领土，即自史温曼德以西的波罗的海沿奥德河至尼斯河西段会流处，再沿西尼斯河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经本会议决定不归苏联管辖的一部分东普鲁士和以前的但泽自由市区域，均由波兰政府管辖”，同时也写明：“波兰西部边境的最后划定，应待和会去解决。”

[20]

二战后，有关波兰西部边境的问题仍长期争论不休，直至1970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时，联邦德国才最终承认了奥德—尼斯河这条边界线。

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的问题自然早就落入三大国的视野。几经磋商，三大国才逐渐由分割德国为五部分和两部分的方案逐渐走向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苏联得以占领约10万平方公里的德国的东部，基本上满足了自己的要求。

在德国的赔偿问题上苏联表现得非常积极，率先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以下的赔偿原则：1、用支付实物进行赔偿；二、支付实物有两种形式，一是战争结束后从德国国内的资产中进行一次性提取，二是战后每年提取商品。同时苏联还明确要求，德国的赔偿总额应为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而美英则共得80亿，余下部分在其他受害国中分配。美英同意苏联提出的赔偿原则，但对苏联提出的具体赔偿数额则持反对态度，特别是英国表示坚决反对。[21]在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由于美国转而支持英国的立场，使苏联陷入孤立的境地，于是只得放弃赔款总额为200亿美元的要求，但仍坚持赔款总额的一半应归苏联。于是美国便建议三大国可各自在自己的占领区取得赔偿，苏联以苏占区仅拥有德国国民财富的42%为由，要求从西占区取得部分赔偿。最后达成的协议为：苏联除从东占区取得赔偿外，还应取得西占区作为赔偿而拆迁的基本工业设备的15%（此部分苏联以同等价值的粮食、煤等原料去换取），另有10%则无偿取得。此外苏联还有权取得德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及奥地利东部的资产，而波兰应得的赔偿则在苏联份额内取得。[22]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至1950年底苏联已取得价值76.58亿美元的赔偿。[23]

日本问题也是二战中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两国都希望苏联能参加对日战争。还在1941年底访问苏联时，艾登便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苏联潜水艇协助美英海军作战的要求，后者则以苏联对日作战的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加以婉拒。[24]但此后美国考虑到未来进攻日本本土可能遭受到的重大损失，越来越倾向于苏联能出兵远东。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斯大林才亲口允诺美国国务卿赫尔将在击溃德国后正式对日作战，使美国方面喜出望外。[25]1944年，苏联和美国就苏联参加远东战争问题进行了频繁的磋商，苏联方面在10月17日将一份对日作战所需要的物资的清单送交美国，其中包括86.04万吨各类军事物资和20.06万吨的燃油。[26]而在12月斯大林会晤美国大使哈里曼时，更提出了苏联在领土方面的具体要求。因此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一切可说是瓜熟蒂落，三大国未经争论便签署了秘密协定，规定苏军出兵远东的条件为：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归苏联、大连港

国际化、旅顺港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该协定使苏联战后在远东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土耳其在二次大战期间采取的所谓“中立”政策带有明确的亲德倾向，它不仅将大量战略物资出售给德国，而且还多次开放海峡，使德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出黑海，炮轰塞瓦斯托波尔等苏军要塞，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尽管美英方面多次敦促，但土耳其却始终拒绝对德作战，使美英两国也颇为恼火。于是一向把黑海海峡视为通向地中海的生命线的苏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修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以恢复它在这一地区原有的优势。它的这一立场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都得到了美英方面的支持，以至苏联有可能在战后向土耳其提出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要求。

#### 四、结束语

国不分大小，也不论其国家的性质，其外交政策的宗旨均在于维护自身的民族利益，正如19世纪著名英国政治学家索尔兹伯里所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民族利益”。十月革命后，在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形成新的社会制度，但其民族利益却和旧俄时期并无二致，即都在于力求成为一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国。斯大林在这方面做得绝不比帝俄时代的沙皇来的差，有些地方甚至还要远远胜出。

苏联首创建集体安全体系，而且也真心实意地希望在欧洲出现一个这样的体系，因为希特勒叫嚷要消灭共产主义、消灭斯拉夫人，其矛头都是针对苏联的。苏联自知凭一国的力量去遏制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希望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一起去应付当时日益严峻的局势。苏联的这样一个意愿最初也曾得到法国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巴尔都等人的响应，但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攫取苏台德地区等十分严重的事件上，苏联提出的有关用集体力量去惩治侵略者的建议却一一被英法所回绝。

慕尼黑协定是对苏联建立集体安全构想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却被凡尔赛体系长期排挤在欧洲政治生活之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虽然苏联积极参加国际裁军会议，加入“非战公约”，提出各种维护和平的建议，但仍然处处受到英法的排挤和打击。1934年苏联终于敲开了国联的大门，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苏联在苏台德危机期间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慕尼黑协定却是背着它签订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勾结使苏联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一个斯拉夫兄弟国家被瓜分，被肢解。苏联也因此再次被驱赶到欧洲之外，深感屈辱和愤怒。

尽管如此，忍辱负重的苏联还是参加了1939年3月开始的莫斯科三国谈判。谈判伊始，英法便显得毫无诚意，张伯伦承认，他对苏联极不信任，对苏联“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没有任何信心”，甚至怀疑苏联的动机。〔27〕由于英法参加谈判的人员仅为大使，级别太低，苏联希望英国能派出更有权威的人士如艾登前来莫斯科。但英国一再拖延，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只派出一个外交部办公厅主

任斯特朗到苏联来协助谈判，岂不令人啼笑皆非。为此，丘吉尔严厉批评张伯伦的这种做法，指出“谁都不愿意同犹豫不定的领导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合作。”

[28]应该说，英法、尤其是英国应对莫斯科三国谈判的失败负主要的责任。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也使不少共产党人顿时陷入困境。其实它只是莫斯科三国谈判破裂一个必然的结果，正如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当时指出的那样：“英法外交家们对待苏联政府是那样的随便，以至于假若是对待我们工党，我们也会像斯大林那样签订1939年8月23日的条约。”[29]显然，苏联是在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的情况下，被迫作出这一选择的。对于当时处境十分危险的苏联来说，要么和英法结盟，要么和德国妥协，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和英法达成协议遥遥无期，而德国却伸出橄榄枝的时候，苏联自然无法加以拒绝，否则便有爆发苏德冲突的危险，甚至可能出现西方国家反苏的大联盟。所以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苏联的最大民族利益便是将战争从自己的身边引开，如果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的目的是将“祸水东引”，那么苏联此时却还以颜色，力图“祸水西引”。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英法和德国的冲突而揭开帷幕的，这一点正和苏联的心意，莫洛托夫对此供认不讳，在1939年8月31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如果这些先生竟会有这样得一种不负责任的打仗爱好，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彼此对打，而不要拉苏联参加吧。我们要在旁观战，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打手。”[30]在这里，莫洛托夫对正在相互厮打的英法德三国都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那么苏德在1939年前签约就更无须大惊小怪了。1918年，被一次大战折磨得筋疲力尽、急需修身养息的苏俄和急需集中全力对付英法的德国终于停止相互残杀，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取得了和解。1922年，因革命而备受歧视的苏俄和因战败而横遭凌辱的德国再次走到一起，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直至希特勒上台，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到了1939年，又是出于各自的需要，苏德两国第三次握手，以便在新的世界战争中各自找到最有利的地位。在短短的21年中，苏德关系的风风雨雨都说明两国政府推行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

在二次大战的后期，当胜负已成定局时，苏联外交又致力于获取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在波兰的领土问题上、德国的赔偿问题上和在远东的领土扩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领土扩展了68万平方公里，并在周边组成一批卫星国，使苏联的民族利益在战后获得更大的保障。

既然苏联的外交政策旨在保卫自己的民族利益，那么也就必然会触及，甚至损害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有肢解波兰和在波罗的海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1940年夏，苏联出兵比萨拉比亚，又顺手牵羊，把一向属于罗马尼亚的北布哥维纳也划入了苏联的版图。1941年4月在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苏联政府竟发出声明，表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然而很难从道义的角度去衡量和评价一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为本国的民族利益服务的。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那么我们应该说苏联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所推行的外交是成功的，因为它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撑下使苏联，尤其是俄罗斯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使之成为战后和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超级大国。

---

\* 金重远，复旦大学首席教授。

---

参考文献：

- [1]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6.1963. С.152 .
- [2]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 [M], v. III, paris 1945. P793
- [3] З. С. Белоусова,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акануне Мюнхена,. Москва, 1987. С.18.
- [4]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4.1982. С.127.
- [5]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Т. . Москва1960. С. 235-240.
- [6] Э. Роштейн, Мюнхенский сговор перег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Москва, 1968. С. 245.
- [7]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Мюнхена,. Москва, 1958. С.99,105.
- [8] *Документы Мюнхенского сговора*, Москва, 1979. . С.312-313.
- [9] *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 мир наканун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 1971. С.336-337.
- [10]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52-755页。
- [11]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Т. II. Москва, 1960. С.64-65.
- [12] 《世界历史》[J]，1998年第5期，92-93页。
- [13] 托因比主编：《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651、653页。
- [14]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第6卷，上部，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37-339页。
- [15] 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M]，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841-842页。
- [16] 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M]，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第56页。
- [17] 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90-191页。
- [18] *Крым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ёх союз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Москва, 1984. С.251.
- [19] 米·小查尔斯：《在波茨坦的会晤》[M]，三联书店，1988年，第180-181页。
- [20] *Берли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ёх союзных держав—СССР,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Москва, 1984. С.439-440.
- [21]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M]，三联书店，1978，第254页。
- [2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8-429页。
- [23] 参见《世界知识》[J]，1990年第9期，第13页。
- [24]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3. 1994. С.119-120.
- [25] C. Hull, *Memoirs*, V. II, New york, 1948. P.1309.
- [26] 托因比主编：《1942—1946年的远东》[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 [27] K.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79. P.403
- [28]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第1卷，上部，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56页。
- [29] 《法国共产党史》[M]，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200页。
- [30] 托因比主编：《大战前夕，1939年》[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864页。

- 上一条: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俞新天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12-15)
- 下一条: [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视域](#) (12-21)

相关专题: 无

相关信息: [苏联外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尚无信息

尚无信息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管理入口](#) |